

# 准确把握中国学术的“时”与“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崔唯航

**【摘要】**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艰辛、砥砺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相对于这些伟大成就而言，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却成为“短板”，在国际上的声音不够响亮、不够有力，依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把握“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个关键点、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时与势，抓住时机、乘势而上，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的思想指引，也为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确立坐标和方向。

**【关键词】**学术研究 时代意识 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5.009

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从根本上看，这种规律服从社会实践的发展演变规律，是时代变迁和实践变革在思想观念领域的集中反映。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学术，无论其表现形态如何繁杂、如何幽深，似乎远离实践，与时代无关，但究其根本，依然是时代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学术研究就像一只风筝，无论它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牵引的线却牢牢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因此，对于学术的考察，首要之点在于把握它所处的时代，以及其特定的时与势。

## 时代意识的觉醒与我们的“时”与“势”

时与势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与时代无关或置身于时代之外的存在。事实上时与势总是置身时代之中，是对特定时代、特定时段之特征和趋势的一种认识与提炼。时与势基于对特定时代的理解和把握，又会对时代发展，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时代自身的考察构成了我们研究的起点。

---

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穿透“我思”——对科耶夫欲望理论的存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阐释》等。



这里所讨论的时代，不是一般意义的时间之流，而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这意味着，时代的意义不能简单地用长度来衡量。时间之流源远流长，但时代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类观念的领域，成为思想的对象却是晚近的事情。在古代社会，人们世代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过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感受到的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没有历史和时代差异，无法形成历史和时代意识，时代也就不会进入人们思想和考察的视野之中，形成时代问题和时代概念。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结束了以往那种地域和民族性的历史，人类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从空间上看，地域和民族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时间上看，原来那种无限度的循环往复被永不停息、永远向前的变革和变动所代替。这反映在思想观念领域，就是历史和时代意识得以真正觉醒。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不断前行的发展态势，促成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感，时代意识应运而生。“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时代问题由此进入人类思想的视野，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人类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整个世界都卷入其中。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上台自由表演。然而绝非如此。事实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从一开始就带有内在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就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历经屈辱，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无边的黑暗有了光亮，中国前进的道路豁然开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日之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换言之，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我们不再仅仅是旁观者、聆听者、被支配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我们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进而“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从大的历史时代的视域看，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基于历史发展大趋势对时代问题的总体把握，它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而非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情形。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

在大的时代条件下，在某一地区、某一特定时间节点往往会集中出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展态势，这就构成了特定的“时”与“势”。这些“时”与“势”，一方面，源于大的历史时代，是时代的“产儿”和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它也会深刻影响时代的发展，加速或延缓时代的发展步伐。

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呈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断推进，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变量，推动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

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为我们辩证认识、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时与势，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也为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确立了坐标和方向。

## 西方学术的限度与中国学术的立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艰辛、砥砺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相对于这些伟大成就而言，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却成为“短板”，在国际上的声音不够响亮、不够有力，依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必须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做好中国的事情，却讲不好中国的故事。这在表面看来是由于在传播上办法不够多、表达不够新、提炼不够准，但实质上还在于我们的学术和知识体系还不够健全，依然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照抄西方理论的做法。“我们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和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sup>[1]</sup>这就导致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制于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学术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所观照的问题，总是西方“镜头”下的“中国问题”，这样的问题所切中的“现实”距离中国现实，就像黄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这怎么能够把握中国的伟大实践，怎么能够总结和提炼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又怎么能够推出时代和实践所呼唤的原创性成果？

中国学术对西方学术的依赖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内在的社会历史根源。从根本上看，还是现

代化浪潮的推动。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把整个世界都卷入了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这股潮流下，一切国家和民族，无论自愿还是被迫，都必须进入其中。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物质的生产如此，知识的生产同样如此。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国家率先迈入现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优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上，而且体现在精神生产的巨大变革上，它逐渐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现代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这套知识体系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历程充满艰辛，知识体系的构建更是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使近代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使封闭已久的中国人不得不“睁眼看世界”，首先看到是技不如人，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制度，于是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其结果以“百日维新”的失败而告终。这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古老的中国要追赶时代，必须从文化、知识体系的现代化开始。

于是，一场向国外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学习这些国家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赶上时代，我们又一次大规模集中向发达国家学习。可以说，经过长期大规模的学习，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开始向现代转换，在相当程度上建构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现代学科体系，实现了与世界学术的接轨，使中国较好地融入了世界，其贡献不容抹杀。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我们在向外国



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地位，往往跟在西方学术的后面亦步亦趋，成为西方学术的“中国版本”。以法学为例，“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治的发展，而只能导致西方法制/法治在中国的移植和拓展，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治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sup>[2]</sup>

更为严重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对此缺乏应有的自觉，往往戴上一副西方学术的“眼镜”，运用来自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来把握中国现实，从而构建出一个想象的中国，并将其误认为现实的中国，这就不仅“错把杭州当汴州”，而且“错把他乡作故乡”，其结果必然是把通往中国社会现实的大门彻底关闭，中国学术沦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庸。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sup>[3]</sup>

为什么会出这种状况？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学术和知识体系还不够健全，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自信，这表现在对西方学术的学习上，就是采取了一种无批判的态度和立场。所谓无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就是不以批判的态度和立场来面对和考察对象，即在澄清其前提的基础上划定其界限，而是无视其产生和存在的特定土壤和适用范围，将本来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知识抽象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并不加分辨地运用到中国现实中去，试图以之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做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忽视了任何知识体系都是特定时代和实践的产物，都有其适用范围，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和界限，真理也会变成谬误；第二，忽视了任何知识体系都蕴

含特定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谓的“绝对客观”和“价值中立”，不过是掩饰其特定立场和价值观的幌子而已。

一旦我们摆脱西方学术霸权的束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会发现，就像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着它永不停息地膨胀和扩张一样，西方学术也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性，它总是竭力扩张到一切可以到达的地方，上演一幕幕西方剧本、地方演员的学术戏剧。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方学。所谓东方学，不过是西方学术的一种“创造”而已，其所蕴含的理念、框架、视角等分析工具均来自西方学术的“工具箱”。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学术却受到了许多东方学者的欢迎，他们以能够较早和尽快掌握这种“操作”技艺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就像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指出的那样，“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地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sup>[4]</sup>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对西方学术中心论及其影响的分析，不是要一概排斥西方学术，更不是要一棍子打死，而是要正确面对和利用西方学术的有益成果，以推进中国知识体系建设。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

谬的了”。

## 中国学术的思想坐标：“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社会变革如此，在社会变革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照抄照搬没有出路，唯一科学的路径只能是立足中国现实，“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为当代中国学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所必须把握的“时”与“势”。

准确把握“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个关键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当前的社会实践，就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中国现实。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和把握这一现实。是不是当前每时每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这里所说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呢？是不是我们随时触手可及的所有事物都是这里所说的现实呢？并非那么简单，不是把所有事物加起来就能得到现实。我们所讲现实，乃是一个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概念，它本身蕴含着“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意味着“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对于这种“必然性”的现实，既不是可以随便触手可及，也不是可以简单把握的，而是需要站在历史和时代制高点，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和洞察力，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循环往复，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到现实，把握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立足中国当时所处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到当前，“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强化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以什么为中心”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不同的中心决定着不同学术的基本形态和面貌。是以传统学术、外国学术，还是以本国现实为中心，在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术是否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一种没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是可悲的，也是无法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国而言，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首先要解决如何面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外国学术的问题，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全盘摒弃和全盘吸收都既不可能又不可行，无论是跟着过去走，还是跟着外国走，都会迷失我们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这深刻揭示了，任何学术无论它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思辨，多么远离现实，“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归根结底，都是时代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只有跟着实践走，跟着时代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有可能获得不竭动力。这同时意味着一种理论自觉，“这样的理论自觉意味着：自知其来历，自知其本质，自知其任务——而所有这一切，又皆归结为能够自知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唯当中国的学术在总体上将揭示和切中当今中国的



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的‘绝对命令’时，其真正的理论自觉才会被决定性地开启出来”。<sup>[5]</sup>

这也就意味着，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必须牢牢立足中国大地，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中国人，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中国这块土地是中国学术须臾不可脱离的思想之源，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勇士安泰，只要脚踏大地，就无坚不摧，一旦离开大地，就不堪一击。中国学术必须立足中国实践，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这为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 中国学术的世界意义和未来向度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东升西降”，其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持续推进，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在一些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彰显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性，同时宣告了人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一条。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

“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推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世界意义将更加充分显现出来。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激荡的大实践、宏伟的大实践孕育并呼唤着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概括和观念提炼，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现代化叙事的思想谱系。目前西方思想界主导的现代化理论都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概括和提炼，不加辨别地将其拿来解释中国，必然带来误解或曲解。因此，建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用来解释和引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伟大实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总体上看，我们尚未建构起一套科学反映、完整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及其实践创新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就是从零开始。事实上，我们已经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绝非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事实上，我们非常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善于及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以丰富和发展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教条，不是书本中的文化符号，而是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相伴而行的思想指南和理论主线，它充满生命力地浸透在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之中，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实践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有待验证的外在对象，而是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源头活水，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从书本研究中产生，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同时也就逻辑地蕴含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sup>[6]</sup>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术的旗帜和灵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学术区别于其他学术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否则，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

知识体系，就要真学真懂真用，不断将其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展望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我们充满信心，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知识体系，让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已经上路。

### 注释

[1][2] 邓正来：《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7~8页。

[3]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25页。

[4] [美]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16页。

[5] 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6] 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2页。

责编 / 肖晗题

##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Time" and "Trend" of the Chinese Academia

Cui Weihang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most extensive and profound soci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and is also carrying out the most grand and unique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human histo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raved hardships, worked tirelessly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has profoundly changed not only China, but also the world. Compared with these great achiev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discourse system has become a "short board". Our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ot loud or powerful enough, and we are still in a situation of "being unable to speak out or spread what we spea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have a firm grip on the key point of "focusing on what we are doing", accurately grasp the time and trend facing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trend,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ideological guidance for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also establish the coordinates and direction fo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ademia.

**Keywords:** academ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s, knowledge system